

楚 汉 战 争 试 析

历史系学员 杨 维 任泽全

人们所熟知的楚汉战争爆发于公元前二〇六年——前二〇二年。这场历时达五年之久的战争，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奴隶主阶级复辟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今天，我们分析楚汉战争胜败的根本原因，对于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战 争 的 性 质

项羽和刘邦两个政治集团，在楚汉战争前，虽然都属于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但是，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阶级基础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在秦灭后，围绕着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个把社会发展引向何处去的问题，各自执行了儒法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了兵戎相见的楚汉战争。

秦始皇以“横扫六合”的气势统一中国，对奴隶主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因此，这个阶级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第一个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怀着刻骨仇恨的，他们总是企图“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项羽就是其中的一个。

项羽出身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其祖先“世世为楚将”^①，被秦所杀的楚国大将项燕，就是项羽的祖父。秦统一后，项羽跟随其叔父项梁怀着亡国之恨、杀亲之仇流窜吴中，在那里勾结“吴中贤士、大夫”^②，暗中纠集旧贵族子弟，偷偷地给他们讲兵法，进行军事训练，拼凑反革命复辟的黑班底。项羽是个野心家。一次，秦始皇巡视会稽，他见后狂妄地说：“彼可取而代之”^③。一语道破了他时刻想夺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特权的狼子野心。公元前二〇九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农民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宣告了篡改秦始皇法家路线、倒行逆施的、由赵高篡权的秦二世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原来的六国旧贵族此时乘机纷纷复国称王，聚众割据。“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④，他们以“因天下之力（利用农民起义力量）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⑤相号召，要“立六国后”^⑥，企图大搞分裂，开历史的倒车。项氏集团就是在报家仇、雪国恨和“取而代之”的动机与目的的指导下起兵反秦的。虽然项羽一度参加过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在本质上却不可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秦朝灭亡后，项羽就被六国旧贵族拥戴做他们的代表，公开打出“计功割地，分土而王”^⑦的旗号，大

搞分裂复辟活动，“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⑧，执行了儒家的倒退复辟的反动路线。

刘邦出身低微，后来做秦的乡村小吏“泗水亭长”。他早年就仰慕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事业，在他到咸阳服役时，看到秦始皇出巡天下，就情不自禁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⑨。此后，他积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参加了反对秦二世反动统治的斗争，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登上历史舞台。在反秦斗争中，他很快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忠实地执行了农民军共同制定的战略方针；灭秦后，在与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的斗争中，他决心要解决“天下纷争”的局面，平定群雄，续承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他坚决执行了一条法家的路线。

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西入武关，直捣咸阳，推翻了秦二世的反动统治。项羽随后驱兵踏入潼关，争夺胜利果实。楚汉战争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战争的实质，就是项羽要分裂，刘邦要统一；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所进行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正义战争，以刘邦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所进行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正义战争。

战争胜败的原因

以项羽、刘邦双方的兵力而论，鸿门宴时，项兵四十万，刘兵仅十万，比例悬殊。楚汉战争中，刘邦又屡次“失军亡众”，多次败北。为什么在五年之后项羽反而兵败垓下，乌江自刎呢？我们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任人路线和军事路线四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一）政治路线

秦王朝前后，围绕着统一和分裂的问题，儒法两家斗争的焦点是：儒家代表着奴隶主贵族的要求，极力维护割据局面，反对统一，妄图保持奴隶制；法家则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积极宣传统一集权思想。儒法两家的相对的政治斗争，在楚汉战争中分别作为项羽、刘邦对立的政治路线体现出来。

由于各自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所决定，项羽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⑩。他竭力要把社会拉回到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割据局面中去，恢复奴隶主贵族统治。刘邦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则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复辟倒退。

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刘邦和项羽进入秦国首都咸阳时，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刘邦入关后，萧何立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遂“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之疾苦”^⑪，作为日后承袭秦制建立统一政权的依据。接着向人民宣布约法三章，废除秦二世反动王朝的严刑苛法（在第二次进占关中后，又把过去供秦二世王朝游猎之用的苑囿河池，让人民垦耕为良田），于是“秦民大喜”，“唯恐沛公（刘邦）不为秦王”^⑫，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与此相反，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⑬。项羽还挖掘秦始皇坟墓，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杀亲之仇。凭借着一时强大的军事实力，项羽又目空一切地自封为“西楚霸王”，以不可一世的“英雄”自居，大封诸侯，割裂国土，划分天下为十八国，“立章邯为雍王”，“立司马欣为塞王”，“立董翳为翟王”，“立申阳为河南王”，“立英布为九江王”……^⑭把秦降将和代表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的二十余人重新戴上了王侯桂冠，使

得“秦人大失望”，“百姓不亲附”^⑤。

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项羽顽固执行儒家路线倒行逆施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反动行为。而且就在这个分封局面之中，也充满了混乱纷争的因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很快地使项羽自食恶果。

由于分封不匀，引起贪婪无厌的六国旧贵族极大不满。如魏豹由魏王改为西魏王，赵歇由赵王改为代王，田市由齐王改为胶东王，韩广由燕王改为辽东王，领土反而比在项羽分封前更为缩小。至于原来诸国的将相未被分封于十八王之列的，如赵将陈余和齐相田荣，更是忿恨“项羽为天下宰，不平”^⑥。于是纷纷起兵反楚，最终导致了项羽集团的分崩离析；而这个缺口，给了被挤在巴蜀封为“汉王”的刘邦以可乘之机，他充分利用项羽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牵制、分散项羽的军事力量。如英布本为久随项羽的大将，结果被刘邦派人诱说“背楚归汉”，甚至为项羽谋划大计的范增也被项羽逼走。于是项羽日益陷于孤立，而刘邦的力量则逐渐强大。

战争的胜负“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项羽执行裂土分封复辟倒退的儒家的政治路线，必然要遭到人民的反对，使得他天下离心，注定要失败。一次，项羽抓来刘邦部将王陵的母亲，威逼她去进行招降。王陵母亲宁死不从，托人转告王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然后“伏剑而死”^⑦。在项羽败走阴陵迷失道路时，一位农民则故意指错方向让他“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⑧。这都充分说明，要求统一，反对分裂，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项羽螳臂挡车，只能以身首异处而告终。

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代表了当时进步的社会力量，终于能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关中人民的支持，使得他不仅在人力和人心方面占优势，而且在军力和经济力方面也日益发展壮大。同时，他在关中、豫西和豫北等地坚决采取秦始皇的郡县制，防止割据混战的复活，做到了军事上占领一地，行政上巩固一地。得寸有寸，得尺有尺。这些都是刘邦最后战胜项羽集团，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的根本因素。

（二）思想路线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都力求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然而“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儒家的思想路线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孔孟拚命鼓吹不懂天命的人就不能做统治者，到处贩卖“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项羽集团代表的是没落的旧贵族阶级，因此完全继承孔孟之道“天命观”的“祖传法宝”。

项羽还在吴中隐匿时，就依仗着他“力能扛鼎”^⑨的气力，自以为受命于天，可以独往独来而恣意横行。起兵之后，更是骄横跋扈，抱着“亡秦必楚”^⑩、“舍我其谁”的唯心主义信条，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刘邦先入咸阳后，项羽的谋臣范增也意识到了刘邦“其志不在小”，但他同样无法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新兴地主阶级处在上升时期的力量，却归咎于“吾令人望其气，皆成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⑪。一派“天命观”的梦呓胡说！由于项羽一伙奉行儒家的思想路线，他们不可能认识战争的规律，更不可能驾驭战争发展的形势。

尽管项羽原来拥兵四十万，但是“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正是这样，项羽由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终于“化优势为劣势”，曾几何时，就陷入“兵罢食尽”^{②3}，四面楚歌的绝境。直到乌江自刎，项羽还以“天亡我”^{②4}来解释他身败名裂的原因，真是至死不悟。难怪连封建史学家司马迁也嘲笑他：“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②5}。

刘邦平生“不好儒”^{②6}，自然不理睬儒家“天命观”的那套陈腐的说教。他针锋相对地说：“我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说明了他不信“天”的摆布，而相信人的力量。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善于收集人材，集思广益，听取不同的意见，采纳正确的建议，因势利导，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次，项羽无可奈何地提出要与刘邦“斗勇”、“决雌雄”，而刘邦微笑回答：“吾宁斗智”^{②7}。“斗智”，就是斗思想，斗策略。刘邦正是在战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路线适应了战争的规律性，得以“屡败屡起”^{②8}。终于“化被动为主动”，成为胜利者。

（三）任人路线

毛主席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楚汉战争中，刘邦执行的是一条“任人唯贤”、“正派的”法家路线。刘邦家近山东，那里的儒生集中。出身低微，与劳动人民接触较多的刘邦看透了那伙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四处游说，不学无术的腐儒的面目，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②9}。对那些儒家的《诗》、《书》他十分厌恶和鄙视。谋臣陆贾曾对他讲《诗》说《书》，刘邦极不高兴地对陆贾说：“你的主公乃是坐在马上统一天下的，用不着那些什么《诗》、《书》。”刘邦对儒生“慢而少礼”，因此“士廉节者（即儒生）不来”^{③0}。而对那些所谓“顽钝嗜利无耻者”^{③1}，即不信儒学、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则十分重用。只要是能够为重新统一天下出力的，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卑贱，社会地位如何低下，都一律按才录用，按功行赏。因而大批有才干的人物纷纷云集于刘邦手下。刘邦用小吏出身的萧何、曹参，背叛了旧贵族阶级的张良，出身低微寒门的陈平做他的谋臣；用屠狗为业的樊哙，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贩布为生的灌婴，编席为职的周勃，拉车渡日的娄敬为将领。以这些人为文臣武将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骨干队伍，在辅佐他重新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们都各自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刘邦曾自豪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③2}。这是他自己对执行法家任人路线的正确总结。

同刘邦相反，项羽好“礼”，在组织上执行的是一条“任人唯亲”、“不正派”的儒家路线。

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主张与孔丘的反动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孔丘为土崩瓦解的奴隶制奔走呼号，要奴隶主贵族“亲亲”，要“继绝世，举逸民”。项羽是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仁而敬人”^{③3}，因此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之下来了。

早在会稽举兵反秦时，项羽就把暗中组织已久的黑班底拉了出来，按照孔丘“故旧不

遗”的圣意，把军队中“校尉、侯、司马”等各级职务都安插旧贵族“豪杰”^③来充当。项羽以“亲亲”为原则，对非贵族出身的人一概排斥。韩信、陈平先后都曾都是项羽的部下，因他们出身低贱而不受重用。陈平投靠刘邦时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④。这是对项羽的任人路线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项羽集团的核心成员完全是由旧贵族遗老遗少和家亲组成的：一是项氏宗族：项伯、项庄、项声、项伦等；二是旧贵族：范增、司马且龙、司马欣等。由于旧贵族阶级尔虞我诈，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的本性所决定，在他们内部并不“亲亲”。项伯在鸿门宴前向刘邦通风报信，私下联姻；范增也与项羽反目，“大怒而去”^⑤。项羽执行儒家的任人唯亲路线，恰恰是孤立了他自己，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仓皇逃窜，乌江自刎的可耻下场。

（四）军事路线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激烈化的表现形式。政治路线决定军事路线，军事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

刘邦以重新统一中国，继承秦制，建立地主阶级专政为政治目的，忠实执行法家路线，因而能正确地制定了楚汉战争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据关中。根据广大人民渴望统一的强烈要求，利用关中优胜的地理条件和依靠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关中“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也”^⑥。对于这兵家必争之地，项羽以为自封霸王，裂土割据的局面已安然实现，因此根本不予重视，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⑦，洋洋得意地带兵东归彭城，以衣锦还乡为满足。而刘邦却清楚地看到关中的重要性，如萧何指出：

“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⑧。刘邦据关中后，派吕后、萧何积极地进行建设，作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此后刘邦在一系列的战役中虽然屡次失利，但因有关中根据地为坚强后盾，运输粮饷，补充兵卒，终能转危为安，实力有增无减。“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能稳操胜券。而项羽则没有巩固的后方，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的粮道又经常为彭越等切断，得不到供应，到公元前二〇三年，已有兵疲食尽之忧了。

二、先发制人，掌握战争主动权。

公元前二〇六年，田荣首先起兵叛楚。项羽见自己在东方分封局面已被打破，遂发兵镇压，因而无暇西顾。刘邦此时乘机先发制人，大举进兵，击败章邯，随后又乘胜继续挥师东进，经河南直捣项羽老巢彭城。同时，刘邦还分兵二路，派另一支军队出陕西，过山西，挺进河北，夺取项羽后方，形成南北钳形攻势。这就使得项羽腹背受敌，处处分兵，陷于被动。特别是刘邦还“谋挠楚权”^⑨，迫使诸侯从汉叛楚，共击项羽。项羽更如同置身于火山口上，疲于奔命。到了公元前二〇四年，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刘邦与项羽的正面作战虽然还失利，但是在北方的进攻却获得节节胜利。项羽南北力量都在逐渐削弱，无力收拾混乱局面。

公元前二〇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相持，而刘邦在北方的军队已从赵地攻占了齐地，给项羽的后方造成致命的威胁。项羽前后受制，一向“嗜恶叱咤，千人皆废”^⑩的项羽此时被迫兵退荥阳，并向刘邦求和，企图玩弄“中分天下”，划鸿沟为界，搞“西汉东楚”^⑪的阴

谋。刘邦识破了项羽的阴谋，于公元前二〇二年，联合诸侯共三十万兵力全力进击，把项羽重重围困在垓下，终将项羽集团一网打尽。

三、军队建设。刘邦执行了法家“以法治军”的路线。“以法治军”，就是要把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作为建设军队的根本，用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刘邦从沛县举兵开始，就注意用严明的法令约束部队。因此，刘邦军队攻克咸阳后，“封存府库财物”，“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②，深受关中人民欢迎，群众“争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③。与此相反，项羽执行的是儒家“以礼治军”路线。“以礼治军”，就是把腐朽没落的周礼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对部队将士很讲究那套虚伪的礼节，实际上是极其毒辣残忍的伪君子。项羽这个不学无术的武夫，“欲以力征经营天下”^④，满以为凭着匹夫之勇就能逆转历史车轮，因此一味穷兵黩武，烧杀掠夺。他进入咸阳后，纵兵“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同掠）妇女而东”^⑤。在击败田荣后，又“遂北烧夷齐城廓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⑥。“以礼治军”，必然对劳动人民极端残暴，从而激起广大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加速了项羽集团灭亡的命运。

历史的结论

纵观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全过程，刘邦集团屡败屡起，由小到大，由弱转强，最后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⑦的激昂奔放、气势磅礴的凯歌声中取得了重新统一中国的胜利。相反，项羽集团则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人不从心，马不从力，在四面楚歌中霸王别姬，哀鸣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⑧之后自刎乌江。这个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各自执行了儒法两条不同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楚汉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兴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我们今天巩固社会主义红色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就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

从两千多年前楚汉战争中复辟倒退的项羽集团的失败，到今天林彪反革命一伙折戟沉沙化为灰烬的可耻灭亡，我们还可以看出，历史上很多事情虽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却往往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充分揭示了：“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①②③⑦⑧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⑫⑬⑭⑮⑯《史记·项羽本纪》

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⑤⑥⑩《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⑨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⑪《史记·萧相国世家》

⑬《史记·秦始皇本纪》

⑮《史记·汉高祖本纪》

⑰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②③《史记·陈丞相世家》

④⑤《史记·蒯彻王孙列传》

⑥⑦《史记·黥布列传》

⑧⑨《史记·留侯世家》

⑩⑪《史记·淮阴侯列传》